

绪论

黄宗羲《明儒学案·发凡》说：“尝谓有明文章事功，皆不及前代，独于理学，前代之所不及也。牛毛茧丝，无不辨析，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。程朱之辟释氏，其说虽繁，总是只在迹上，其弥近理而乱真者，终是指他不出。明儒于毫厘之际，使无遁影。”^①明代的理学比宋代理学高明的地方，在黄宗羲看来，就是明儒能够对于哲学中各种概念的细微差别作出辨析。从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，一种学术思想当其初创时总是具其规模气象而不缜密，到后来才渐渐趋于细节的分疏。明代理学上承宋元理学，处于理学发展的末期，其哲学思考趋于缜密，当属自然。然而，明儒‘牛毛茧丝，无不辨析’的功力哪儿来的呢？自然一方面是学术积累的结果，而另一方面，学者之间的辩论和相互启发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明代学者之间面对面地讨论，在当时有一个比较时髦的术语，即“讲学”。清儒程嗣章说：“明代道学，固不及洛闽之醇，而穷经通儒，亦罕闻焉。独讲学之风，较前代为盛。”^②这句话，倒是比较精练地概括了宋、明、清三朝学术风气的区别：明儒既无宋代道学的醇正，

①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·发凡》，《明儒学案》，页5。

②程嗣章：《明儒讲学考》，页1。

又无清代经学的穷通，独有讲学之风，蔚为大观。吴震先生也说：“在 16 世纪的明代知识界，‘讲学’本身俨然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或时代风气。甚至可以说，讲学活动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主要话题。”^①与“讲学”二字相关联的，还有“讲会”二字。讲会即讲学之会，也就是说大量的学者定期聚集在某个地点一起讨论哲学问题。讲会正是讲学风气发展到明代而臻于高峰时的产物。当然，对于讲学、讲会的定义和内涵，及其与明代社会的关系，不能不详加讨论。

第一节 讲学与讲会

首先，怎样理解“讲学”的含义？从字面上看，“讲”就是“言说”，就是通过语言表达而传送某种信息。无疑，这种信息就是“学”。因此，理解“讲学”的确切含义，关键在于了解不同时代讲学活动中的“学”之所指。也就是说，“讲学”这一概念的内涵随着学术变迁而发生变化。当然，大体上说，讲学是一种教育活动，可以是较高层次的学术切磋，也可以是较低层次的教化活动^②。可以是官方性质的讲学^③，也可以是私人的讲学。然而，官学数量的有限和效率的低下，使私学成为古代学者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，而官学

^①吴震：《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（1522—1602）》，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，页 3。

^②吴震先生《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（1522—1602）》：“所谓讲学，从狭义上说，无非是学者之间的一种学问切磋。从广义上说，讲学无非是一种教育、一种面向民众的教化活动。”（页 36）

^③官方讲学，以明代为例，从最高统治者接受教育的“经筵”“月讲”，到国子监的教育活动、地方官学的教育活动，皆可谓之讲学。

充其量只是一个资格或出身而已。因此，“讲学”在很大层面上是指“私人讲学”——据说创始者即孔子。

讲学始于孔子，是后代儒家的主张。晚明学者顾宪成就说：“讲学自孔子始。”^①儒家学者视孔子为私人讲学的首创者，是将“讲学”视作“儒学的讲学”。当然，何心隐就说，学与讲，其实可以溯源至伏羲、尧、舜、文、武等圣人；又奚惟原于孔子而始有学名以名其所学，始有讲名以名其所讲耶！^②其实，私人讲学的发生，可以追溯至西周的村塾。陈青之先生以为，《礼记·学记》郑注中“古者仕焉而已者，归教于闾里，朝夕坐于门，门侧之室曰塾”的话，描述的就是归乡的士大夫在乡里讲学的情景^③。这大约可视为最早的私人讲学。春秋时期，讲学者也不止孔子一人。道家和墨家的讲学活动，都比较频繁。孔子讲学，不过诸家之一。不过，“讲学”的出典，却似出于孔子语录《论语》。《论语·述而》中记载孔子的话说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后来的儒学传授基本上就是在“修德、讲学、徙善、改过”八字上作文章。清儒汪中解释“学之不讲”四字说：“讲，习也。习，肄也。古之为教也以四术，书则读之，礼乐同物，诵之，歌之，弦之，舞之，揖让周旋，是以行礼。故其习之也，恒与人共之。学而时习之，有友朋自远方来，所谓君子以朋友讲习也。……孔子适宋，与弟子习礼大树下，鲁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，皆讲学也。”^④按汪中的解释，“讲学”就是“学习并实践礼、乐”；“讲”不只是简单的口耳相接，

①顾宪成：《小心斋札记》卷十四，广文书局1975年影印本，页80，转引自吴震《阳明后学研究》，页423。

②何心隐：《原学原讲》，《何心隐集》第一卷，页5。

③陈青之：《中国教育史》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，页31。

④刘宝楠：《论语正义·述而第七》，诸子集成本，上海书店1986年版，页136。

讲的内容‘学’包括一切与人的社会活动相关的礼仪和物事。这样的解释,可能确是真实地反映了孔子对于‘学’的理解,但也许更多地体现了后儒对“讲学”的理想化解释。在躬行实践的学者看来,儒家当注重实际,即事即学^①。因此,‘讲学’只是一种实践,而不是高谈阔论。但是,理想化的解释毕竟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,事实上,讲学即是‘口耳授受之习’。典籍之难得、学术之垄断,是口说传业以讲学发达的背景。葛志毅先生说:“先秦至西汉,口耳授受是其时各家通得的学习传习方式。”^②其实,即使到明清,乃至到今天,口耳授受之“讲学”也必不可少,变化着的只是讲学的模式而已。

孔子的讲学,是‘一种流动式的讲坛制’^③。孔子门人众多,讲学甚久,但没有固定的讲坛。他的学生多半随从他四方游历,一面游历,一面讲学。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即说孔子曾与弟子们习礼于大树下。《庄子·渔父》说:“孔子游乎缁帷之林,休坐乎杏坛之上,弟子读书,孔子弦歌鼓琴。”据说,杏坛只是‘泽中高处’^④,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。孔子之后,儒分为八,各讲其学。孟子师子思,讲‘仁义’‘性善’,辟杨朱、墨翟。孔孟之后,儒家讲学进入一个屈伏的时期。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初年,教育活动基本上为法家与黄老所把持。秦始皇‘以吏为师’的诏令,更是剥夺了儒

①明代学者吕柟就曾对弟子们说:“汝辈今日在此讲论,不消拘拘于经史上。即如今日用应接上下,或言语衣服,却都是学。故当时曾子、子夏讲论时,常说今日某人行冠礼差,又说某人行丧礼差,一一在这上面考究。今人说及此,便以为粗迹了。”参见吕柟:《泾野子内篇》卷十四,中华书局1991年版,页138。

②葛志毅:《今文经学与口说传业——试析古代的讲学传业方式及其文化历史原因》,《历史教学》1994年第5期,页6。

③陈青之:《中国教育史》,页53。

④王先谦:《庄子集解》,诸子集成本,页205。

家私人讲学的合法性。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倡儒家，遂黜百家而崇儒术、尊孔子。儒家之讲学，由此在朝廷提倡下重新繁荣，最初由国家提倡，后来学者自动地开门授徒，进行私人讲学。东汉经师们的讲学，非常普遍。范曄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说：“自光武中年以后，干戈稍戢，专事经学，自是其风世笃焉。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，盖布之邦域矣。若乃经生所处，不远万里之路，精庐暂建，赢粮动有千百。其嗜名高义，开门授徒者，编牒不下万人。”像郑玄、马融，讲学之名甚盛，弟子云集。当时经师讲学，似不如后代理学家讲学之严肃。马融讲学：“坐高堂，施绛纱帐，前授生徒，后列女乐，弟子以次相传，鲜有人其室者”（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）。汉儒之讲学，多是在私宅进行，偶尔建有精庐、精舍^①。精舍似后代之书院。清人尊崇汉学，往往立书院而以精舍名之。自汉至唐，儒者讲学方式大体相同，只是汉儒讲训诂，唐儒于训诂之外兼攻注疏^②。书院讲学，始于宋代。这是儒家讲学方式的一次重大变化。它的出现，与宋儒融合儒佛道三家精意创为宋明理学紧密联系。书院的出现，即模仿佛家禅林而设。宋代的学者，往往依山水佳胜之处，创建书院，传授理学。朱熹就是创建书院的积极推动者。不过，宋儒中也有不喜创建书院者，如陆九渊^③。但是，书院作为宋代理学的主要讲学场所是不争的事实。宋代书院讲学的内容，不再是汉唐的训诂注疏之学，而是与身心修为紧密相关的性命之学。

① 范曄《后汉书》卷六七《党锢传》：“（刘）淑少习明五经，遂隐居，立精舍讲授，诸生常百余人。”

② 陈青之：《中国教育史》，页233、234。

③ 韩明士（Robert Hymes）：《陆九渊、书院与乡村社会问题》，田浩（Hoyt Cleveland Tillman）主编：《宋代思想史论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，页445—474。

然自讲学的形式观之,书院仍秉承汉代讲坛的遗意。陈青之先生即说:“宋代书院与汉代经师讲坛的性质很相类似,或者就是私设讲坛的遗意。”^①李弘祺先生以“绛帐遗风”指称书院之讲学,亦即此意。元代书院虽有官学化的倾向——主持者山长多由政府任免——然而大量的私立书院依然存在,讲学内容以理学为主,书院之私人讲学性质并未改变。

至此,讲学的历程可以梳理成 春秋战国诸子的游历讲学(孔子、孟子)——汉代经师的私塾或精舍——宋元的书院。自讲学内容看,则可梳理成 诸子学——汉代经学(古文与今文、讖纬与训诂)——唐代经学(训诂、注疏)——宋元理学(程朱理学、吕学、陆学)。明代的文学家归有光(1505—1571 年)所说:“汉儒谓之讲经,而今世谓之讲道”^②。“讲学”或“讲学者”,在不同时代则有专指。例如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内有一段话:“夫汉学具有根柢,讲学者以浅陋轻之,不足服汉儒也。宋学具有精微,读书者以空疏薄之,亦不足服宋儒也。”^③这便是以“讲学”专指“宋学”。因此,一方面,讲学“普遍受儒家学者的关注”;具有了一种超乎时代的特征”^④,另一方面又在形式与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因此,对于“讲学”的考察,必得综合各时代学术状况、社会状况进行。

明代的讲学,其时代的特征尤其明显。其最突出的特征,即是

① 陈青之:《中国教育史》,页 233。

② 归有光:《送何氏二子序》,《震川先生集》(四部丛刊)卷九,页 9。按归有光此论,是欲引出其“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”的重经思想,并影响了明末清初的钱谦益、方以智等人。可参见何冠彪:《明末清初思想家对经学与理学之辨析》,《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研究》,台湾学生书局 1991 年版,页 11。

③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·经部总叙。

④ 吴震:《阳明后学研究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,页 423。

讲会的流行。明代讲学区别于前代讲学的特殊性，即在讲会。讲会是明代讲学的最重要、影响最大的一种模式，也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一种模式。大概从 16 世纪起，明代的讲学者中绝大部分参与或组织过讲会。在 16 世纪及 17 世纪前期，讲会是学术圈赖以形成的主要运作方式。参与讲会的学者，很容易被接受成为主流而不参与讲会、独行其是的讲学者，往往被视作异端、腐儒。那么，明代的讲会是怎么一回事？与前代讲学有什么区别？该如何定义呢？

《教育大辞典·中国古代教育史卷》对‘讲会’的解释是：“与书院教学、学术活动相联系的学术组织。名称最早见于宋朱熹《白鹿讲会次卜文韵》诗。”^①《中国书院辞典》对讲会的解释略近：

讲会，又称联讲会。一种与书院教学、学术活动相联系的学术组织。开展活动时，一般均有特定课题，或有关读书、问难、规劝等具体内容。据讲会规约，规定时间、地点、主持人等。宋淳熙六年（1179 年）朱熹曾以《白鹿讲会次卜文韵》赋诗。明代以胡居仁倡办较早，到明中叶，渐及南北，规矩亦趋遂密，如惜阴会、青原会、紫阳会、东林会等。^②

《中国教育史研究·明清分卷》则称：

讲会是书院讲学的一种形式。其目的在相互探讨争辩，或发挥一个学派的精义，或辨析不同学派之间的差

^① 《教育大辞典》编委会：《教育大辞典·中国古代教育史卷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，页 145。

^② 季啸凤：《中国书院辞典》，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，页 700。

异。讲会地点可在书院，也可在书院之外。南宋的鹅湖之会，首开不同学派同台论辩之先河，奠定了书院讲会的良好传统。入明以来，王守仁重振理学，讲会乃大盛。^①

胡青《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》内说：“所谓讲会，就是学术团体。”^②李才栋说：“讲会应是一种学术组织、学术团体，故史籍中常有联讲会、结盟社之说。……讲会组织是传播学术思想、道德观念的重要途径。”^③何平立说：“讲会是南宋以后书院讲学的重要组织形式，也是书院区别于官学和一般学校的重要标志。”^④这一类教育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和工具书，对于讲会的性质的规定约略分以下几个层面：（1）讲会与书院相关（但也有认识到讲会地点可在书院之外者）；（2）讲会是一种学术组织；（3）最早的讲会名称出现在宋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^⑤；（4）最早有据可寻的讲会是著名的朱、陆鹅湖之会；（5）明代讲会始于胡居仁，盛于王阳明。应当说，这些论述有一定的科学性，具体考证和史实根据都比较可靠。例如，明代讲会始于胡居仁，大约源于《明儒学案》的记载——“归而与乡人娄一斋、罗一峰、张东白为会于弋阳之龟峰、余干之应天寺”^⑥。朱陆鹅湖之会，自然是“讲学之会”。当然，讲会是否是一

①周德昌：《中国教育史研究·明清分卷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页102。

②胡青：《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页273。

③李才栋：《关于书院刻书与讲会等问题的一封信》，《教育史研究》2001年第2期，页34。

④何平立：《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文化精神》，《学术月刊》2002年8月号。

⑤据明李梦阳撰《白鹿洞书院新志》（《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》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）卷七文志所载，朱熹《白鹿讲会次卜文韵》全诗如下：“宫墙芜没几经年，只有寒烟锁洞泉。结屋幸容追旧观，题名未许续遗编。青云白石聊同趣，霁月光风更别传。珍重个中无限乐，诸郎莫若羡腾骞。”

⑥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》卷二《崇仁学案二·文敬胡敬斋先生居仁》。

种学术组织,需要进一步讨论。吴震先生在对惜阴会及其会约探讨后指出,即使像惜阴会这样在王门中名声颇大的一个讲会组织,从严格意义上说也不是一个学术组织,因其没有严格的人数限制和与会者身份地位的限制^①。吴宣德也认为,讲会是‘讲而会之’之义,指一种活动,而不是一种‘组织’”。吴宣德先生还进一步指出,从词源学的角度上来说;‘讲会’一词的出现也并不在朱熹的诗中——在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中,佛教徒们讲经时常举采取集会的形式,称为‘讲会’,且宋乾道六年(1170年)朱熹所作《答胡广仲》(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四二)即已有‘讲会’的说法^②。因此,教育史、书院史方面对于‘讲会’的探索,尽管已有不少的创见,但仍未切入‘讲会’内涵的核心。

诚然,‘讲会’即‘讲学之会’^③,而讲学必定是群居而讲,因此必定也是“讲会”。明代讲会的提倡者、王阳明的大弟子钱德洪(字洪甫,号绪山,1496—1574年),就基本上将讲学与讲会划等号:

三代而上,无讲学之会,师友之道寓于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间。其为教也素明,其为学也有本。故自洒扫应对以至诗书礼乐,无一非教,自顺亲敬兄以至经世

①吴震:《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(1522—1602)》,页37。

②吴宣德:《“讲会”定义献疑》,《教育史研究》2001年第4期,页6—8。

③吕妙芬先生说:“何谓讲会?广泛地说,讲会就是讲学的聚会。但是明代的讲学聚会有许多种形式,例如书院中日常的讲学,朋友们不定期的交游、相晤问学的聚会,教化地方大众、类似于乡约的社会讲学,以及地方缙绅士子们组成的定期讲学活动等。……有时三五人私下相问学的聚会便是一个地方性定期讲会的前身,有时一个纯粹士人的讲会也逐渐演变成类似乡约的聚会,官学或书院中的课程也会因某名儒的到访而举行特殊的讲会。参见吕妙芬:《阳明学讲会》,《新史学》第9卷第2期,1998年,页46—47。

赞化，无时非学；自闺闾社席比闾州党以至宗庙朝堂，无地非会。故虽无讲会之名，而有讲会之实。后世士之所趋日流于富贵声利之习，而道德性命之理日微，任道者忧之，乃出而纲纪道脉，指悟人心，而四方同志翕然归德，故邹鲁濂洛而降，天下始有讲会之名。吾师（王阳明）倡明《大学》宗旨，数十年来，四方同志讲会日博，有司之良任风化之责者，又能为厚廩饩、广斋舍以作成之。^①

钱绪山认为，三代以上无讲学，三代以下孔子之后有讲学，亦有讲会。对于明代“讲学”问题，钱绪山认为阳明之后“讲会日博”，突出了阳明对明代讲学发展的贡献。王栋（字隆吉，号一庵，1503—1581年）的观点，也略相近：“定期会学，古未有之。无日不学，无日不会也。后人者学术太轻，往往以职业相妨，不遑暇及，不得已姑与约立会期以救离群索居之失，因已一暴十寒，去古人之志远矣。”^②相对来说，晚明另一位学者孟化鲤（字叔龙，号云浦，1545—1597年）对于“讲会”概念的分析要细致得多：“唐虞三代时，则有学而无讲之名，讲学自孔子而始，彰由孟子，迄两程时则有讲而无会之名，会讲^③自朱陆而始著。”^④在孟化鲤那里，就明确区别了两程的讲学与朱陆会讲之间的不同，同时也指出“讲会”始于南宋之

①钱德洪：《贺程后台序》，转引自彭国翔：《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》，《中国文哲研究通讯》第13卷第2期，2003年6月，页52。

②王栋：《明儒王一庵先生集》（1910年袁氏排印本），会语续集，页35。

③会讲即讲会，二者区别甚小。陈来先生认为按当时的习惯用法，“会讲”指聚会讲学的活动，“讲会”指会聚讲学的组织。参见陈来：《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》，《中国学术》第四辑，2002年，页1。

④孟化鲤：《兴学会约序》，《孟云浦先生文集》卷四，页7。

朱陆会讲。钱穆先生‘讲会’问题的考察的论点,与孟化鲤的观点略似。钱穆先生说,中国古代的私学教育发展有两条线索:一条是学校之线索,自私人寺庙读书、书院、州学以至太学,然‘惟政治不上轨道,此线之进展即告终止’。另一条是学会之线索,初期为学校之变相,如二程之讲学,第二期为朱陆之讲学,门徒渐多,第三期则如阳明弟子之讲会,阳明弟子之讲会与朱陆之讲学的不同之处,乃在‘完全脱离学校气味,变成纯粹之社会公开讲演与集会研究性质’,从而形成‘讲堂’与‘讲会’的区别:‘从前的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。讲会则由会中延请讲者,所请不止一人。……会毕则主讲者又转他所。如是轮番赴会,其事较前之讲堂,又为活泼展扩。’^①至此,我们至少看到关于‘讲会’起源的三种看法:钱绪山、王栋的‘三代以下讲学/讲会’论,孟化鲤的‘会讲自朱、陆始’论,钱穆先生的‘阳明弟子之讲会’论。

到底哪一种说法准确?判断的标准自然依赖于对‘讲会’的理解。这样,通过考察‘讲会’的萌芽来寻求‘讲会’的定义,似乎只是一种循环的论证。寻求‘讲会’的定义,似乎需要依靠对‘讲会’最流行的时代——明代中后期——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的考察,以及对‘讲会’内部结构的考察。也就是说,讲学至明代而演变为讲会,取决于明代的社会环境、学术环境。葛兆光先生指出,明代讲学风气甚盛,有其社会背景。他说:

随着城市、商业、交通以及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发展,知识传播更加容易,也越来越超出官方意识形态允许的边界,士绅与市民所拥有的财富资源,也使得另外开辟

^① 钱穆:《国史大纲》,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,页805—806

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的渠道成为可能。正是在这样相对自由的背景下，大批士人重新开创了体制以外的讲学风气。^①

但是，明代讲会的风行，其根源还是在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运动中。作为学术传播形式的讲会，其实是由其传播内容——明代的阳明学——所决定的。从思想根源上看，明代讲会流行与阳明学的流行密切相关。自嘉靖（1522—1566年）初年方始流行的讲会，其高低起伏与阳明学在明代的盛衰几乎同步。也许可以说，讲会实际是阳明学的产物。正如吴震先生所言：“阳明学作为一种思想学说，固是理论思辨的产物，同时阳明学的产生及其展开过程本身又是一种思想运动，其具体表现就是讲学”^②。湛若水和王阳明在讲会的最初形成和流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，而真正使讲会遍行天下的则是王门的后学，如王畿、邹守益、钱德洪、欧阳德、刘邦采、罗汝芳等人。至于晚明如顾宪成等人的东林讲会，虽标榜为以朱子学为宗，然讲会之成员、制度与阳明学讲会乃一脉相承。因此，寻找讲会的思想根源，自然要到王学中去寻找。

首先，阳明学所具有的开放性，给阳明后学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和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性。王守仁逝世之后，大批王门弟子召开讲会以印证师说，从而进一步宣扬师说，所谓“以振微言”^③。阳明学提倡尊重个体心性之自由、轻视知识，因此而带来的修习方法上的缺陷使群居讲学成为重要的辅修手段。阳明学所崇尚的是

①葛兆光：《中国思想史》第二卷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页300。

②吴震：《阳明后学研究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，页422。

③邹守益：《广信讲语》，《东廓邹先生文集》卷七。

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境界，而对于外部的知识的追求并不重视。但道德的境界如何达到？王守仁本人及其后学都认为，师友之间的切磋是必不可少的。阳明生前曾于正德十年（1515年）作《夜气说》，称：“今夫师友之相聚于兹也，切磋于道义，砥砺乎德业，渐而入焉，反而媿焉。虽有非僻之萌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。迨其离群索居，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，欲可得纵而莫之泥也。物交引焉，志交丧焉，虽有理义之萌，其所滋也亦罕矣。”^①邹守益的弟子郭汝霖（字时望，号一匡，1553年进士）也曾说道：“性善是真种子。……凡改过迁善、惩忿窒欲、会友讲习，皆商量谋度以培植灌溉，使此种子畅茂条达。”^②而且，在阳明看来，口头的传播要较文字之传播更为重要，故阳明又说：“某些意思，赖诸贤信而不疑，须口口相传，广布同志，庶几不坠”；讲学须得人人面授。^③泰州学派学者颜钧说：“圣人因心以立学，因学而成会，会惟成学，学必立会。”^④晚明学者张鼐也说：“夫众人之动其良心也，以会以语也。”^⑤也就是说，人的良知尽管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，但是，既然不能通过向外的方式从自然界中“格物”格得，那么在返求内心深处的同时，我们总还是需要同道中人的警醒的，以免走人寂灭之地。总之，阳明学因其理论上的缺陷，使得讲学活动不但是建构一个学派所必需的，而且是每一个人的内心修养所应当重视的。因此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讲会是属于阳明学的。

其次，阳明学所提倡的人与人在成圣成贤上一律平等的思想，

①王守仁：《阳明全书》卷七。

②郭汝霖：《再答宋华阳》，《石泉山房文集》卷六。

③钱德洪：《刻文录叙说》，《阳明全书》卷首。

④颜钧：《扬城同志会约》，《颜钧集》卷四，页30。

⑤孙慎行、张鼐：《虞山书院志》卷七，会语

使‘友道’大行于明代。英国学者约瑟夫·麦克道莫特指出,明代最后一个百年中有倡扬友道的风气,像湛若水、何心隐、冯从吾、利玛窦等都表达出对于友道的尊重。他着重研究了何心隐、顾宪成、高攀龙、黄道周等学者关于友道的阐述,指出这些友道思想通常产生于私人书院、文社和慈善团体的活动中^①。张璜先生认为 16 世纪后半期的晚明社会,普遍展现出鲜明的自我意识与主观价值,在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的实践过程中,出现了追求同伴、寻求知己的现象,如张岱、陈继儒、李贽、三袁等都是如此^②。在明代的思想家中,我们可以举出许多重视友道的议论。例如,何心隐认为朋友是与君臣同等重要的伦常,所谓‘君臣之道,不有友朋设教于天下不明’;‘天地交于泰,交尽于友也。交秉交也,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’^③。耿定向说:‘求友是性命。’周柳塘说:‘养心莫善于求友。’^④刘元卿说:‘开迳相求,不如多助于四友之大也。贻书摘谏,又不如相观而善之切也。’^⑤顾宪成说:

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,自古圣贤无有
离群索绝孤立无与的学问……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则一国
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,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;群一国之善
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,而精神充满乎一国

① Joseph P. McDermott, *Friendship and Friends in the Late Ming*, 台北‘中研院’近代史研究所,〔美〕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系:《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》上册,1992年,页67—96。

② 张璜:《偕我同志——论晚明知识分子自觉意识中的群己观》,《东华人文学报》第5期(2003年7月),页161—182。

③ 何心隐:《论友》,《何心隐集》第一卷,中华书局1960年版,页27。

④ 耿定向:《与周柳塘》之二,《耿天台先生文集》卷三,书牍。

⑤ 刘元卿:《请举朝讲疏》,《刘聘君全集》卷一。

矣；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，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。…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各有专主，而朋友则无所不摄。……非朋友无以成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，非讲习亦无以成其朋友。^①

许孚远说：“向道而行，循性而动，激发于师友箴规之际，而退省于幽独隐微之中。”^②罗近溪“每以书院多集朋徒为快”^③。邹守益弟子朱叔相“深以厌喧耽寂为戒……终其身无日不以讲学会友为事”^④。由此可见，明代中后期讲会的流行，与阳明学所激起的“以文会友、以友辅仁”的风气密切相关。讲会活动与高倡友道互相支持，互相推进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宋元的讲堂重师道，而明代之讲会重友道。综上所述，尽管宋元两代已经有“讲会”出现，清初亦复延续明代讲会风潮而有讲会之举，但就其大势而言，讲会是明代的讲会，因为讲会的真正流行与普及乃是在明代，其发挥影响也是在明代，也只有在明代中后期，才有着讲会风行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背景。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讲会乃属于明代。

第二节 明代讲学的相关研究

对于讲学运动进行系统、专门的研究是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。在此之前，研究明代思想史（哲学史）、政治史、社会史以及教育史

①高廷珍：《东林书院志》卷三，会语一。

②许孚远：《觉堂说》，《敬和堂集》卷三。

③管志道：《追求国学乡学社学家塾本来正额以订书院旁额议》，《从先维俗议》卷二。

④王时槐：《松岩朱君墓志铭》，《友庆堂存稿》卷五。

(尤其是书院史)的学者对于明代的讲学活动多有涉及。涉及的角度不同,解释的框架也不同。因此,对此问题的研究史的追溯也可以依次从四条线索来展开。由于笔者闻见所限,必不能穷尽每一领域中涉及讲学之论述,只能是做一些简单的介绍。

在研究思想史的学者看来,讲学、讲会是明代中期——除了追溯到王阳明讲学,一般还会上溯至陈白沙,甚至最远至薛瑄、曹端以来学者传播其学问的主要途径。研究阳明学,则势不能不谈讲学活动,这是因为讲会是王学传播及其展开的主要方式,同时也是阳明学内部讨论及与程朱学者、佛道人士探讨学问的主要形式。在对明代思想史的考察中,晚明思想界之复杂曾引起学者的无限遐思。这种复杂性的形成,就有明代中后期讲会的功绩。如果说明代学者内部的分门别户是个事实的话,那么讲会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门户的界限:一方面讲会成为各种意见陈述和表达的公共场所,从而成为学派之间冲突和辩论的场所;另一方面,较讲堂更具开放性的讲会由于容忍不同门派的学者共同商榷,从而又促成了更多的学术交流和互动。因此,学者们更倾向于认为,研究明代中后期学者的讲学活动,较之单纯地研究其师承更有利于研究者深入思想家的内心世界。这也是研究阳明学的学者不可避免地要谈及讲会的重要原因。实际上,现有的对于明代讲学的专门研究,从钱穆到陈来、吕妙芬、吴震等人,都是沿此一路径展开的。这些都容后再述。此处先谈思想史方面涉及讲学之论著及其代表性的观点。

较早对明代思想史作过系统研究的容肇祖先生所著的《明代思想史》^①,对于讲学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进行探讨,但是,容先生此

^①容肇祖:《明代思想史》,“民国丛书”据开明书店1941年版影印本。

著对于明代的若干讲学人物如湛若水、王守仁、王畿、邹守益、聂豹、罗洪先、王艮、黄绾、胡直、何心隐、李贽、焦竑、顾宪成、高攀龙、刘宗周等人的生平及其思想有非常全面的介绍，是研究明代思想史的入门书籍之一。研究讲学问题，势不能不读此书。近年来出版的张学智先生所著《明代哲学史》^①，也是依一般的哲学史体例对明代哲学家的哲学依次介绍，其中除对明代思想史的著名哲学家有研究外，还注意到像王时槐（塘南）这样的讲学者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《宋明理学史》的下卷^②，基本上也是对明代理学家们的生平及思想介绍，其中湛若水、王守仁、王畿、邹守益、钱德洪、聂豹、罗洪先、刘宗周、王时槐、张元忬、何心隐、罗汝芳、顾宪成、高攀龙、刘宗周等人，都是著名的讲学者。嵇文甫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写成的《晚明思想史论》除了对王阳明及王门弟子有所阐述之外，还对活跃于晚明讲学的所谓“狂禅派”，如颜钧、何心隐、邓豁渠、管志道、李卓吾，以及张居正及东林学派的思想作了深刻的阐发^③。

一些思想通史著作也涉及明代的讲学风气问题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四卷下册第二十二章“泰州学派的思想及其阶级性与人民性”、第二十三章“泰州学派继承者何心隐的乌托邦社会思想”、第二十四章“李贽战斗的性格及其革命性的思想”、第二十五章“东林党争的历史意义及其社会思想”，就分别对王艮、何心隐、李贽、东林学派顾宪成和高攀龙的讲学活动有详细的描述。该书内有一段话极精彩：

① 张学智：《明代哲学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。

② 侯外庐、邱汉生、张岂之：《宋明理学史》下卷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。

③ 嵇文甫：《晚明思想史论》，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。